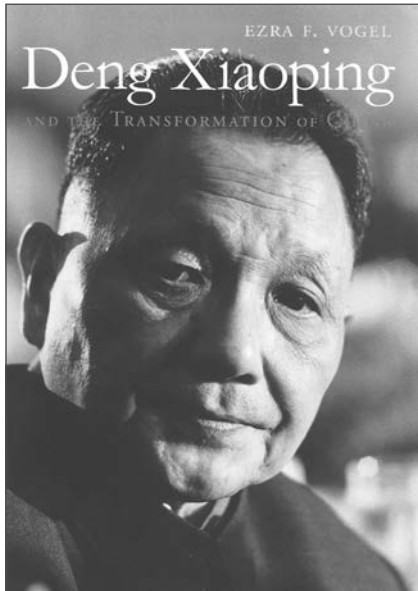


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

——評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鍾延麟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美國哈佛大學傅高義 (Ezra F. Vogel) 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學者，長年鑽研東亞區域發展，著作豐

碩等身。傅氏在2000年開始研究鄧小平，經過十年的辛勤耕耘後，在2011年秋出版《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引用只註頁碼)①。由於傅氏得益於近年來大量面世的中共歷史與政治資料，也利用他個人跨越多國的豐沛政學人脈搜集文獻、交流意見，使其新著在付梓後，旋即成為西方同題著作中最具份量的作品。僅就篇幅(頁數)而論，傅作是其他類似著作的兩倍以上。鑒於傅氏本身的學術地位與其新著的傳播和影響力，筆者在此加以引介與評論，也希望藉此增進對西方的中共菁英人物研究以至中共歷史研究現狀的認識。

一 內容與特色

傅教授在《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中關注的課題是：鄧小平如何

由於傅高義得益於近年來大量面世的中共歷史與政治資料，也利用他個人跨越多國的豐沛政學人脈搜集文獻、交流意見，使其新著在付梓後，旋即成為西方同題著作中最具份量的作品。

* 筆者要特別感謝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陳永發教授、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澳大利亞莫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孫萬國教授曾對本文初稿惠予指導與評論。本文文責概由筆者自負。

作者關注的是：鄧小平如何在歷經政治顛簸後，終於一躍成為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並以此為主軸，細密描寫與詳細介紹鄧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如何對中國大陸產生巨大而深遠的政經影響與意義。

在歷經政治顛簸後，終於一躍成為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並以此為主軸，細密描寫與詳細介紹鄧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如何對中國大陸產生巨大而深遠的政經影響與意義。作者認為鄧的歷史地位不應被低估，因為他獨具的領袖特質、別人難望項背的政治歷練與政治威望，以及突出的領導能力與手腕，讓之成就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強人如孫中山、袁世凱、蔣中正以及毛澤東未竟的事業，即帶領中國真正找到並走上通往富強的道路。

全書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鄧小平的背景，簡要說明鄧從出生、入黨，到文革時下放至江西前的這段經歷；第二部分是鄧邁向中共層峰的曲折過程，包括他如何在文革中復出並在毛澤東之領導下進行經濟整頓，繼而又如何失去毛的信任而再次倒台，以及其如何在繼承毛大位的華國鋒的領導下，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第三部分是鄧開創屬於他自己的統治局面，內容主要有：鄧在1970年代末如何成功取代華成為中共的第一把手並開始施行自己的領導，如何應對蘇聯與越南合圍對中國大陸造成的威脅，以及促成中國與美國、日本關係的交好，遂行其對外開放、引借外力以促成國內經濟建設的目標；第四部分是鄧引領的時代，討論內容涵括多方面：鄧的領導統御之術，廣東、福建的經濟特區實驗，1980年代首先進行的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以及其後加速經濟成長與擴大對外開放，當時中共政治的波浪起伏，還有鄧主導推出的原先針對台灣問題而來、後來套用在香港問題上的「一國兩制」政策，以及他

對軍隊的治理；第五部分是鄧時代所遭遇的挑戰，包括1989年鄧的領導如何被以學生為主的抗議民眾所質疑，以及鄧最後用武力所作的強硬回應，還有鄧如何處理流血鎮壓後中共所面對的內外壓力，進而在1992年初以南巡的方式再次推動改革開放；第六部分是鄧的歷史地位，尤其是綜述在其治下中國大陸所發生的鉅變。在本書的後面，細心的作者還附上一個「鄧時代重要人物」小傳，將內文中論及的若干中共要人各自作一簡略介紹。

就筆者看來，此著有三項特色：第一，作者為了寫作此書，採訪了很多與鄧小平有直接、間接接觸和關係的人士。在中國大陸方面，作者訪問了鄧三位女兒中的兩位，鄧時期其他黨國領導人如陳雲、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的子女，還有一些鄧主政時的高級幹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江澤民以及幾位中央部長與省級領導。在外國方面，作者訪問了親身參與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過程的美國前總統卡特 (James E. Carter) 與數位國務卿與國家安全顧問、與鄧有正式往來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還有澳洲前總理、香港前總督，以及多位曾駐北京的各國使節。

作者多方搜集訪談資料，讓此書含有不少獨家信息而增色許多。例如：鄧家人說，鄧小平有無理會任何批評意見仍堅信自己決策正確的個人性格 (頁626)，以及其在一小圈範圍內進行諮詢與商議的決策方式 (頁353)。萬里的兒輩對其家父與鄧的長年關係所作的觀察——鄧一直作為萬的上級，但後者從未視前

者為密友(頁738)；葉劍英晚年病重住院期間，鄧未曾探視(頁373)。作者在描寫鄧的外交活動與對外往來時，更常利用訪談所得，起到補充書面文獻、為其論述畫龍點睛的作用。

第二，作者對於鄧小平主政前後所作的外交經略，以及鄧努力將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接軌並向之取法的細緻描寫，是書中另一亮點。作者相當精彩地重現了1970年末鄧為了限制越南的擴張企圖、懲罰它對中共的恩將仇報並同時示警蘇聯，接連奔走訪問東南亞、美國、日本諸國，對中共出兵懲越預先作外交通氣。作者也對中共懲越戰爭本身與其長短期利害進行了仔細的描述與分析，認為鄧主導的這場戰爭在軍事上雖付出不小的代價，也暴露出中國解放軍作戰、協調不力的問題，但是其成功達到防止越南徹底吞併柬埔寨、進而席捲中南半島、危及東南亞整體情勢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嚇阻了蘇聯的南下企圖。鄧也聰明地利用中越邊境的緊張關係，換兵駐防，進行戰地輪訓，增加解放軍實戰經驗，同時也藉此迫使越南屯駐重兵防備，進而大量消耗其軍事、經濟資源，使之難以負荷，最終不得不收縮觸角、撤離東國。

作者也指出，鄧小平藉由出訪爭取國際理解的同時，另一個重要目標是實地觀察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發展，謀求與之合作，充分利用其資金、技術與經驗，發展中國大陸停滯不前的經濟，以盡快縮短與國際發展水平之間的懸殊差距。作者利用其自身嫻熟美國與日本政經情勢的優勢，詳細介紹鄧造訪美、

日的過程細節與影響。經由作者細膩而生動的描述，可以讓讀者近距離感受：鄧當時力主暫擱中國與美、日之間的政治、外交爭議，以期營造雙邊友善關係的積極性；鄧親歷見聞有關國家的先進發展時，夾雜震驚、欽羨，又深感母國不爭氣、得改進的複雜情緒；以及鄧為了獲得相關各國對他重啟中國對外之門、重建中國經濟等政策的政治支持與實質襄助，所表現出來的謙虛謹慎、低調自持。

另外，根據作者所述，鄧小平在開啟國門並成功架起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橋樑後，在規劃國內經濟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問題上，他甚為注意徵詢國際企業家、外國經濟官員的意見，也歡迎與重視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所作的調查與建議，例如鄧要世界銀行研究他所提的經濟「翻兩番」目標(在二十世紀結束前，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與人均增長四倍)是否可行。

第三，作者在介紹鄧小平的個人歷史與治理影響時，也將其觀察視角擴及同一時期的其他重要人物，換言之，作者意圖呈現的是一個以鄧為核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領導群體，其主要包括：政治影響與鄧相仿、也與之存有分歧的陳雲；長年政治不倒的李先念；鄧在1980年代先後安排、但接連被罷黜的政治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意識形態領域嚴密把關、發揮重要政治影響的鄧力群；以及挺身力擋政治壓力、在廣東成功開創經濟特區的任仲夷等。筆者以為，作者對若干中共要人所作的介紹與分析，其中對讀者帶來的新知與新意，有時甚至超過他對傳主所作的述評。

作者在介紹鄧小平的個人歷史與治理影響時，也將其觀察視角擴及同一時期的其他重要人物，換言之，作者意圖呈現的是一個以鄧為核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領導群體。

作者以「改革者」概括鄧小平從事改革開放的政治作為與歷史角色，但在書中相關用詞卻存在前後指涉內容不一的問題，令讀者容易感到莫衷一是，也反映此一用詞在形容鄧小平時的局限性。

就以在書中也佔有不少篇幅的陳雲來說，作者為了強化對鄧小平的認識，特意同時開展了對陳的研究，因為他認為陳是鄧主政期間最大的政治對手。作者對陳的描寫以及提供的相關資訊，一方面可以讓讀者認識到鄧在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與陳有些不合拍（陳不同於鄧，力求經濟穩健與維持計劃經濟的主導角色）、但又擺脫不開的複雜關係（在1980年代初經濟過熱與1988年鄧主導的物價改革失敗後，陳每次對經濟的治理與降溫，實際上乃為鄧下一波經濟衝刺提供重要的基礎）；另一方面也使讀者感受到不同於中共官方論述所塑造的光輝高大的陳雲形象。例如：為了不讓鄧的政治聲望一枝獨秀，陳在1980年代初允許鄧力群對自己進行政治宣揚與吹捧，特別是突出陳在歷史上對經濟問題的一貫正確（頁722）。另外，根據作者的描述，陳與文革期間進入中央高層的紀登奎關係不好，乃因在大躍進後關於經濟需要多久才能復蘇的問題上，當時在河南任職的紀提出比較樂觀的看法，毛澤東深表欣賞，並公然以紀所作的預測對比陳傾向悲觀的看法（頁731）。此說實是難得一見的陳雲記仇、多年不忘的例子。

讀者若再連繫到陳雲早年在高崗問題中敏感而關鍵的角色（有論者指出陳先是鼓勵高崗活動，後又作為鄧小平以外的另一主要的揭發者^②），以及後來在倒華國鋒上的積極作為，陳的另一個不同於官方營造的政治臉譜隱然若現。至於在大躍進後的農業問題上，陳在1962年不僅支持包產到戶，更進一步主張分田。鄧當時支持陳，也

認為包產到戶、甚至分田皆是可考慮的^③。換言之，鄧、陳兩人當時走得比作者所想的還更「離經叛道」。

二 鄧小平的歷史定位與過往經驗的影響

作者以「改革者」(reformer) 概括鄧小平從事改革開放的政治作為與歷史角色，但在書中相關用詞卻存在前後指涉內容不一的問題，令讀者容易感到莫衷一是，也反映此一用詞在形容鄧小平時的局限性。

從序言內容與第一章的標題「從革命者到建造者、再到改革者」，即可知作者對鄧小平生平歷史所作的劃分與不同定位：早年是參與推翻國民政府、建立中共政權的「革命者」(revolutionary)；中年是協助毛澤東建立新的政治體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造者」(builder)；之後則是在文革中受害從而覺察體制之弊病、在晚年從事變革的「改革者」(reformer)。作者進而指出鄧在文革初被打倒、1969年被流放至江西時，已成為一名「改革者」。鄧及其助手在文革後期推行整頓，作者也以「改革者」名之。

然而，第十五章作者在記述改革開放時期時，又使用「建造者」(builder) 一詞來形容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張加速發展、借引外資者，以有別於以陳雲為首的主張維持計劃經濟、重視收支平衡的「計劃者」(planner)。在作者之後的描述中，「建造者」逐漸同義於「改革者」，並為後者所取代。「改革者」與「計劃者」兩詞到後來除了作為兩種不同

經濟傾向的代稱，還分別加入了政治進步與政治保守的意涵。在此變動的背景下，作者有時將鄧歸類為「改革者」（或「建造者」）、有時又將之置於針鋒相對的「改革者」與「計劃者」之上，但在論及1989年不安的政局時，鄧又明白地被置放在支持趙紫陽的「改革者」的對立面。俟1992年鄧南巡、再次推動改革，「改革者」的桂冠又重新被戴到鄧的頭上。

以上除了反映作者使用「改革者」一詞的隨意性外，也突出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事實：鄧小平作為一名臉譜多面、具有高度政治複雜性的領導人物，所處的也是一個變化不斷的政經環境，可以用簡單、劃一的詞彙去概括或解釋他嗎？這恐怕是「改革者」一詞難以蔽之的。

作者探討的重心皆放在鄧小平在毛澤東後期以及鄧主政時期的「改革者」角色，對鄧服務前朝（毛時期）的「建造者」角色及相關事迹記述甚少，甚至存在錯誤的認識，這難免會影響到作者對後來作為「改革者」的鄧的分析。

鄧小平在主導中國大陸發展以前，長期在毛澤東麾下服務。鄧不是一般的高級幹部，而是毛的股肱，高度、積極地參與毛所設想的追求中國富強的道路與方案。毛經過開國後數年的探索，在1950年代中期逐漸在各領域推行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驗中，鄧每每作為毛的重要先鋒與代理人。然而，作者對鄧在相關歷史中的地位與角色問題，估計不足之餘也存在錯誤。例如，當談到大躍進運動，作者指出鄧作為執行者，向來比毛更務實、實際，藉以交代鄧在運動中的

角色和意向，並根據訪談所得指出：鄧在1959年中即感到有問題，並開始有意不出席要求與會者支持運動繼續進行下去的官方會議；作者也指出鄧在1960年起一連兩年在經濟的務實調整上扮演領導的角色（頁41-42）。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1958年初當毛澤東決定發起大躍進時，他大幅擴張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職權，讓之從管黨務進而到監管、綜攬政府事務，統帥政府各部與地方黨委，具體形塑與貫徹執行運動。鄧在肇禍極大的三年大躍進中，對運動保有一貫的熱情與信念，有時在構想計劃時甚至比毛還不切實際；鄧一直站在運動的前線，不但沒有閃躲迴避，更將運動硬撐至1960年底④。

作者對文革前鄧小平的歷史輕描淡寫以至認識有誤，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讓其研究只聚焦在鄧晚年推行改革開放的功績勳業，而忽略、輕縱了鄧在毛時期失敗試驗中的效力過程和政治責任。作者在研究鄧晚年後盛讚：在二十世紀有任何其他的領導人在改善這麼多人的生活，做得比他還多嗎（頁690）？但是，關於文革前中共黨國對民間社會所進行的各項改造工程，以及伴隨而來的後果，作者似乎無意深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數百萬人被劃為反黨份子並遭到殘酷對待，人民的言論自由實際上被取消與剝奪，社會氣氛呈現死寂狀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在「三面紅旗」高掛下缺糧致死、陳屍溝壑；城鄉百姓分別被禁錮在單位與公社中，既喪失自主的權利，也失去努力生產的誘因。作者是否也應該要問：在當初

作者對文革前鄧小平的歷史輕描淡寫以至認識有誤，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讓其研究只聚焦在鄧晚年推行改革開放的功績勳業，而忽略、輕縱了鄧在毛時期失敗試驗中的效力過程和政治責任。

作者注意到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提出諸多有別於毛時代的政策與做法。然而，鄧所作的改變中，哪些是毛的主張？哪些既是毛、也是鄧原先置信並獻策獻力的主張？

中共政權造成這麼多人陷入不幸與困頓的問題上，鄧涉入了多少？作者沒有準確把握到鄧中年爭議性的角色與活動，只看到、着重鄧晚年扮演「解救者」的部分，恐不能全面地掌握、評價鄧如何長時期影響中國現代發展的軌迹。

作者對鄧小平歷史的「輕前重後」，事實上也限縮了他對文革後鄧的認識深度。作者注意到鄧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提出諸多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政策與做法，例如：不要將政治運動當作達成政經目標的手段；探索政策時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不要只講「全國一盤棋」、齊步走，也要允許局部的靈活性、試驗性；專心發展自己，不要對他國事務比手畫腳……（頁564-65、391、398-99、613-14）然而，鄧所作的改變中，哪些是毛澤東的主張？哪些既是毛、也是鄧原先置信並獻策獻力的主張？這些轉變出現的原因，與鄧參與文革前毛時代領導的經驗和對之的省思有多大的關係？

舉例來說，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摒棄政治運動，除了因其造成的混亂外（文革是其極端的發展，鄧及其家人皆深受其害），鄧在文革前即作為大小政治運動的重要操盤手，熟悉運動的運作邏輯與正反效應，這些經驗是否促使他從更深的層次體悟到運動方式不可行？改革開放後鄧主張「少爭論」、「做了再說」，包產到戶就是一例，這是否與鄧在1962年就同一問題曾想放手一試，卻因意識形態的上綱上線而只得放棄的遺憾有關？改革開放後鄧讓部分的地區與群體享有政策彈

性，是否與鄧在文革前、特別是大躍進中不顧各地實際，動輒一竿子插到底、不准有異例的負面教訓有關？改革開放後鄧強調要建立穩定的周邊環境以便專心於國內建設，是否含有鄧反思自己在文革前輔助毛不顧國力地與蘇聯爭馬列主義道行高低、向周邊鄰國輸出革命造成外交緊張的因素？可惜作者對以上問題都沒有思考與回答，只告訴讀者：鄧晚年推行的改革開放就是變革毛時代的體制與政策，在另闢新徑下從各方面改變了中國大陸。作者沒有注意到同一個過程是否也是鄧檢討、改變自己，尤其是他對自己中年時的政治追求與實踐所進行的一次擇取和揚棄。

作者對文革前鄧小平的角色與中共歷史的忽略，也多少影響到對鄧的黨內地位與人際關係的描述與認識。如前所述，鄧與陳雲的關係及兩人之間的比較，作者甚為關心，也作了很細密的考察（頁721-22）。鄧比陳資歷淺，何以後來居上？關於此一問題，作者沒有特別注意與強調兩人在文革前十年不同的政治權位與遭遇。毛澤東在1956年思考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事問題時，曾表示在台上唱主角的將是周恩來、陳雲與鄧小平。但他真正寵信的是鄧，在1958年初「反冒進」大批周、陳後，毛對鄧更是器重，讓之統管全局的工作，從而積累大量的領導管理經驗與各種人脈。相形之下，陳除了在1962年上半年的經濟問題整治上有機會顯露一手外，政治上多受毛冷落，到後來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也沒讓他參加。鄧在此一時期得以展現

能力與獲得磨練，陳相對地泰半坐政治「冷板凳」，這一長一消之間，實質上為兩人在後毛時期各自的政治能量，提供了不同的基點。

另外，作者注意到鄧小平與開發大慶油田有功、作為「石油派」掌門人的余秋里在經濟主張上的相近看法（皆主張加快發展、增加投資），以及鄧在政治上對余的支持（余的經濟職務被陳雲人馬佔去後，鄧將余調任軍方要職）。但是作者在試圖重建鄧、余兩人的長年關係與歷史淵源時，竟然全然忽略了一個極為關鍵的部分——1960年余計劃開發大慶油田時，鄧鼎力支持。余的回憶錄對此就有詳細的記載^⑤。

三 歷史敘事與解釋

作者在描述與解釋鄧小平的政治作為與後果上，有時稍嫌簡單，且有需要商榷之處。以下略舉四例：

（一）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關於導致鄧小平在1975年秋冬一下子從握有重權到瀕臨失勢倒台的轉折問題，作者認為除了毛遠新在毛澤東與鄧之間起到疏遠、分化的作用外，鄧為劉冰轉呈批判文革支持者的信，加深了毛的疑慮，恐怕其一手發動的文革來日會遭鄧否定，更是關鍵因素。在此情況下，毛要鄧主持制訂一個正面肯定文革的決議，鄧加以婉拒，毛從而決心倒鄧。鄧為何不願接受毛指派的任務？作者給出的答案是鄧以中國前途的需要為重，並援以鄧女鄧榕和薄一波的說法為證，強調鄧早有不

怕被再次打倒的決心，而肯定文革就如同自縛手腳，不便於之後各項改革的發起（頁149-50）。

事實上，鄧女與鄧的同僚對1975年底鄧所作所為的這種堅持真理、擇善固執的解讀，已有論者提出質疑並指出：毛要鄧主持制訂肯定文革的決議，以鄧過往的政治歷史與事君經驗，他不太可能採取直接違抗毛的姿態；對於文革評價問題，鄧在此前即曾順毛心意肯定文革並誓言永不翻案，在這次檢討過程中，也承認自己對文革的認識有錯。鄧斯時不願擔起制訂文革決議的任務，可能的打算是：張春橋擅長起草這類政治決議文件，由之負責，得心應手，對鄧自己也省事；在研議相關決議的過程中，一定會涉及個別具體問題的討論，鄧想迴避從中可能引發的爭辯；要在當時處於嚴重對立的中央高層間，建立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的共識，已屬麻煩，如何最終讓毛感到滿意，更是費力^⑥。鄧的政治應對反而加重毛對他原有的懷疑，讓情況持續惡化，終至難以挽回。

無論當時真正的政治盤算如何，鄧小平這次冒然拒絕毛的提議，造成全盤皆墨的後果，在中共黨內不是沒有批評聲音。此時已在病榻上的周恩來一直很關心鄧的政治處境，曾派人傳話要他注意策略。當周聽聞鄧推卻主持制訂文革決議一事後，直接對鄧表示：「你就不能忍一忍？」^⑦葉劍英曾以「不撞南牆不回頭」評論鄧^⑧，恐怕也是指此而說。鄧此一自信果斷以至剛愎自用的政治性格，在1989年處理學潮時又清楚地顯露。鄧一旦將相關

毛要鄧主持制訂一個正面肯定文革的決議，鄧為何不願接受毛指派的任務？作者給出的答案是鄧以中國前途的需要為重，並援以鄧女鄧榕和薄一波的說法為證，但已有論者提出質疑。

鄧小平利用掌握在其手上的黨史解釋權，巧妙地同時達到維護黨的統治合法性、提供自身施政便利性與維護自己形象、收攏人心，以及保持高層團結的作用，同時也把歷史解釋權轉化為一種懲罰他人的工具。

的抗議活動透過《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定性為動亂後，縱使其他中共領導人想方設法要緩和事態、改變鄧的態度，都沒有成功，使得事件最後以嚴重流血收場。

(二) 對中共歷史的解釋與運用

在1980年代初以評價毛澤東歷史功過為主要內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歷史決議〉）問題上，作者指出鄧小平在制訂此文件時找到一個微妙平衡：一方面，對毛予以足夠的讚揚，以避免削弱黨的權威；另一方面，批評毛晚年嚴重的歷史錯誤，以為鄧走不同於毛的政治方向開路（頁373）。在鄧維護毛的歷史地位時的個人利害計算問題上，作者僅說如此可以讓那些過去與毛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人（包括鄧小平）的權威不致陷於危險，而沒有作深入的討論，因此錯失了藉此觀察鄧對於自己深度涉入的政治與歷史爭議，有不完全正視己責、甚而避重就輕的傾向。

例如1953至1954年的高崗、饒漱石事件，鄧小平是主要的揭發者與處理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取代高的地位）。他當年在相關問題上是否小題大做、有否處置不當？鄧在討論〈歷史決議〉時一言定奪，堅持維持原案，既為毛開脫責任，也確保自己當年所建的事功。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鄧」。五十餘萬的運動受害人最後被改正者（「右派」帽子雖被摘掉，但沒有像平反者可獲實際補償）高達99%以上，但鄧不顧多人的異議，仍堅稱此事正確，問題只在於擴大化而已。鄧在研議〈歷史

決議〉時堅持當年反右的正確性與必要性，既有為自己留顏面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現實上為其日後動手懲處對黨的領導提出質疑者留有餘地，以示有案可考、有例可循。在大躍進問題上，鄧強調不能要毛獨攬全責，因為大家都頭腦發熱。既然對該運動人人皆有責，按鄧所提的「宜粗不宜細」原則，分清、細究個人責任的大小輕重，就沒有必要了。在此情況下，鄧身為運動的「副帥」，也就是在毛、劉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要角色與龐大責任，反而因此被淡化，僅形同是領導集體的一員，更在「法不責眾」、「向前看」的說詞下，全然獲得解脫，甚至還博得勇於正視錯誤、出面扛責的美譽。

鄧小平利用掌握在其手上的黨史解釋權，巧妙地同時達到維護黨的統治合法性、提供自身施政便利性與維護自己形象、收攏人心（例如鄧為劉少奇、陶鑄平反，劉、陶各自的遺孀王光美與曾志對鄧的義舉銘記在心），以及保持高層團結（陳雲與彭真兩人在國共內戰初期東北問題上的爭論，在1980年代又重新掀起，鄧指示不要吵，雙方的意見皆存檔留案）的作用[◎]。另外，鄧也會把歷史解釋權轉化為一種懲罰他人的工具。林彪與陳伯達在文革中與鄧為敵，後者顯然沒有忘記。在林葬身大漠、陳身陷令圜近十載後，鄧仍將他們連同「四人幫」一併送交法庭公審，將已有的政治定讞再冠上法律的形式（作者在書中提及林、陳兩人不多，但基本就按照鄧定調下的中共官方口徑描述）。

(三) 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作者同時陳列出官方、學界及媒體等各方對參與該事件的主要行為者所提出的批評與質疑，包括針對當家作主的鄧小平、同情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立場強硬的總理李鵬、呈報敵情嚴重的北京市負責人陳希同與李錫銘、內部聲音多元的抗議學生，以及對事態關心、投入的西方人士與媒體等。作者也羅列各方對該事件所提出的不同發展劇本與假設，例如：在甚麼情況下或可以不會發生此一流血慘案？鄧若沒下令動武「清場」，中國大陸又可能會遭遇甚麼情況？不過，作者在拋出各方意見與前述的假設性問題後，卻僅僅表示自己無法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頁638）。

作者這種不願多加評判、想要置身事外的做法，難道完全沒有任何的傾向性嗎？這有些像在「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政治辯論中，針對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負責人對譚震林的相關文章有所保留、表示不願介入時，鄧小平就指出：「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⑥在書中，作者把「天安門事件」的主要行為者各自的可資爭議處同時羅列的做法，實質上模糊了這些當事人之間明顯存在的權力落差與責任輕重問題。易言之，掌握最高權力的鄧能形塑政治環境、可對各方上呈的情資與方案自主作出選擇，其對事態發展的影響與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大大超過其他行為者。在探討天安門慘案的成因時，將鄧的個人作用與他人並列視之，似乎相形減輕了指向鄧的各種責難的力度。

再者，相較於作者在書中對鄧小平其他政策的詳述與政績的深描（例如對鄧出兵越南所作的長短期利弊得失的探討），他對這個關乎鄧政治生命與政權統治延續更為關鍵的爭議決定及其深遠影響，卻又手搖頭表示無能為力作答，如此畸重畸輕，難免讓人感到有些失望。此外，中共官方長年來開動宣傳機器對鄧的改革功勳大力傳播，然而對鄧身陷的政治爭議（如「六四」）卻百般辯護，甚至將後來多種因素合力促成的穩定、發展局面，簡單歸因於這次武力鎮壓。中共官方這種不平衡、有缺失的歷史敘事，作者未必認同，但他在將這些相關言論當作一種聲音與意見列入書中時，也沒有對之作出任何批判性的思考。

(四) 對中共十四大的描述與評價

關於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先，作者指出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按其講話精神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決定代表對鄧基本觀點的確認，並將鄧與毛澤東的信念、政策的長久影響加以對照：鄧的政策因符合經濟需要與人民期待，可以繼續指導政策制訂數十年，相形之下，「毛的基本信念（階級鬥爭與繼續革命）在毛死之前已開始弱化，在他死之時，相關信念也隨之而亡。」（頁685）作者此處對毛的政治主張之後續持久力的論斷，實有失簡單之嫌，也與他對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中共政局的描寫有所矛盾。作者筆下的鄧與其他「保守的理論家」（conservative ideologues），長年以來在毛教導薰陶下所形成的階級鬥爭思維，不正對他們先後發起「反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作者把「天安門事件」的主要行為者各自的可資爭議處同時羅列的做法，實質上模糊了這些當事人之間明顯存在的權力落差與責任輕重問題。

作者對鄧小平的實質討論，停留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也讓他遺漏了鄧在1993年9月對改革開放所作的重要思考，也就是在全力求發展後必須面對處理的分配問題。

自由化」，以及用敵意的眼光看待與解讀1989年學生運動，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嗎？

其次，在中共十四大的權力轉移的政治意義上，作者指出：江澤民在此會上積極地確認繼續改革開放，鄧小平也展現對江的全力支持，「從此刻起，江再也無須回首察看鄧是否認可；權杖被授予給這個被鄧與其他人視為黨第三代核心的人。」(頁685)這給人一種江從斯時起完全當家主政、鄧也放心而不再過問的感覺。然而，實際情況並未如作者所言的「一刀切」，最起碼在重要的外交議題上，鄧還是繼續垂簾聽政。根據中共外交人員的自述，中共十四大結束後超過半年，也就是1993年中，關於江是否接受美國邀約，利用該年底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舉行之機舉行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一事，即由鄧拍板決定；江在有關外交場合的講話，也以鄧的指示為本而進行發揮^①。作者對鄧的實質討論，停留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也讓他遺漏了鄧在1993年9月對改革開放所作的重要思考，也就是在全力求發展後必須面對處理的分配問題^②。分配的嚴重不均與其引發對社會公義的不滿，實是影響今後中國大陸社會能否持續保持穩定的一個重大變因。

此外，書中也存在一些事實錯誤。例如：作者說鄧小平在中共的江西蘇區遭受政治批判後，受命負責整個蘇區的宣傳工作(頁7)。事實上，鄧所任的是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上面尚有中央一級的宣傳部長，其地位與影響力非作者所講的那麼

大；況且鄧當時正被嚴厲批判，實難以行使相關的職權，不久之後即被撤銷職務、另作安排。又如：作者介紹鄧妻卓琳的家庭背景時，提到卓的父親浦在廷是一位著名的雲南火腿生意富商，後來在土改中被殺(頁32)。然而，根據卓的姊姊浦代英所述，鄧的岳父是1950年在家病逝，卓因行程耽擱而未能趕在父親臨終前見其一面^③。

另外，比較明顯的錯誤還有：中法兩國正式建交於1964年，作者將時間誤作1962年(頁119)。作者指出鄧小平1975年成功出訪法國與毛澤東、江青的死亡，使得中共官員在1970年代末開始有機會出國訪問「取經」(頁218)。除非作者在這裏明白指的是江青政治生命的終結，不然，江青真正身亡的時間是1991年。作者在描述1989年的學生運動時，宣稱學生群聚新華門、要求進入中共黨政首腦機構所在地中南海，乃是中共1949年接管政權以後，第一次有抗議者作出如此要求(頁602)。事實上，在文革中，革命群眾與上訪請願者就曾多次衝擊中南海。作者指稱學生採行的絕食抗議，是在中國抗爭傳統之外所另增的新穎辦法(頁610)。實際上卻不然，這個辦法常見於早年中共人員在監獄中為改善政治和生活待遇所發動的政治抗爭中。在書後所附的「鄧時代重要人物」小傳中，關於導致習仲勛1962年政治倒台的小說《劉志丹》問題，作者誤以為該小說出事乃因其宣揚劉志丹與描述劉如何被毛澤東錯誤對待(頁740)。事實上，當時爭論的主要問題是該小說是否為高崗的歷史翻案，而習被

指控是幕後的操盤者。鄧小平當年對此事的立場為何？這並不在作者的關心範圍之內。

四 結論

綜上所言，傅高義費時多年、用心所著的這部鄧小平傳記，確有值得推薦之處，有助增進對鄧小平以至更大面向的中共政治的認識。但此著也留下不少值得追蹤的議題，例如：頗受鄧信任的王震，在中共建政初期以強硬手段處理新疆問題，遭到毛澤東批評而被調離職務^⑭。書中指出鄧主政後重新啟用王處理相關事務，並曾在王的陪同下視察新疆。這反映了鄧在邊疆管理與民族政策上抱持的是甚麼樣的思維？此外，在鄧設想的改革開放與黨國管理中，政法工作佔有甚麼地位？其對中國大陸法治發展有何影響與局限？

針對鄧小平這位個人生平與中共歷史緊密交織、對中國大陸發展發揮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傅氏的研究成果是令人稱賀的，然而，相關的研究並未因此而告一段落，事實上，還需要更多細緻的觀察與具批判性的分析。

註釋

① 該書中譯本參見傅高義 (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②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114-16。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32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713。

④ Yen-lin Chung, "The CEO of the Utopian Project: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69 (January 2013), 154-73.

⑤ 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603-11。

⑥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382-84, 407-10.

⑦ 秦九鳳：〈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所想到的〉，《黨史博覽》，2006年第12期，頁12。

⑧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576。

⑨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73。

⑩ 雷聲宏：〈《紅旗》發表譚震林文章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5年第4期，頁22。

⑪ 王嶠生：〈對美外交的「較量」與「捧場」〉，《領導文萃》，2010年第1期(下)，頁96-98。

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364。

⑬ 浦代英：《無悔的歲月》，引自亦凡公益圖書館網站，www.shuku.net:8082/novels/history/wfdsypdy/wfdsy10.html。

⑭ 曉何：〈王震與新疆牧區改革風波〉，《文史精華》，2007年第12期，頁4-12。

針對鄧小平這位個人生平與中共歷史緊密交織、對中國大陸發展發揮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傅氏的研究成果是令人稱賀的，然而，還需要更多細緻的觀察與具批判性的分析。